

吐鲁番史

主编 田卫疆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鲁番史/田卫疆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8

ISBN 7-228-08991-X

I. 吐… II. 田… III. 吐鲁番市—地方史
IV. K2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013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8.375
字 数 420 千字
插 页 8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48.00 元

编委会

主 任 宋爱荣

副主任 阿不拉·卡斯木 孙昌华 田卫疆

编 委 宋爱荣 阿不拉·卡斯木 孙昌华
吴福环 苗普生 田卫疆 赵文泉
伊弟利斯 王素 荣新江 水 涛
殷 晴 魏长洪 张玉忠 巫新华
李 肖 阿不力木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赵文泉

顾 问 陈国灿 王炳华

编写人员 田卫疆 薛宗正 齐清顺
钟兴麒 刘学堂 施新荣
艾碧不拉

序

吐鲁番是一个神奇而极具魅力的地方。这里有世界第一低地艾丁湖,有被诵为“一片青山一片红”的火焰山,有被誉作第二条地下长城的坎尔井和饮誉天下的葡萄,还有魅力独具的维吾尔族风情。

吐鲁番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造就了它极具个性的人文历史。上个世纪初开始在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的众多文物曾惊震世界,其价值可谓举世无双。目前散落在国内外的吐鲁番文物已成为人们解读中外历史谜底和认识新疆古代文明的标本。众多资料有力地证明,吐鲁番在新疆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经济以及文化交流的通道,是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争夺的焦点,更是中国历代王朝统一西域、维护西北边疆社会稳定的中枢所在。吐鲁番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浓缩了新疆各族人民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又是新疆历史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恢弘篇章。



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了这块土地。吐鲁番出土古物证实,早在遥远的石器时代,这里就存在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吐鲁番地区成为一个多民族活动聚居的地方。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秦汉以后曾先后有车师、塞人、匈奴、汉、呿哒、柔然、突厥、回鹘、蒙古、满等众多部族和民族活动过。可以说,诸凡我国北方草原上活动过的几乎所有游牧部落和民族都曾光临或进入此地,迁徙流动,聚居融合,留下其驰骋活动过的痕迹。汉族在此活动的历史也比较久远,魏晋时期,由河西麹氏家族创建的“高昌国”曾控制该地区达一个半世纪之久,极大地丰富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内涵,这是当时西域地区惟一的由汉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情况,因为该地后来大量出土的包括《论语》读本在内的汉文文书残卷而得到有力的证实。

吐鲁番各族人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勤劳创新的精神,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明,形成该地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格局。古代吐鲁番的棉花、葡萄及其酿酒技术很早就传入中原地区;高昌乐舞以及绘画、戏剧艺术都曾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同样,中原地区许多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也传入吐鲁番,先后为当地人们所吸收。众多古代部落、部族和民族在吐鲁番地区的流动聚居与物质生产活动史事,以及该地在贯通东西方关系的“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枢纽作用,还使吐鲁番地区形成自古以来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显著特征。这里曾使用过诸多语言文字,流行过佛教、摩尼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多民族的迁移融合与多种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会合,构筑了博大精深、宽容多彩的古代吐鲁番绿洲文明,并对今天该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吐鲁番自汉代以来一直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吐鲁番地区同新疆其他地方一样,纳入祖国版图,并成为历代中央政府管辖治理天山南北各地军政事务的中心之一。公元前 48 年,汉朝政府在此设置主理西域驻军屯田事务的机构——戊己校尉。前凉时期设置著名的高昌郡,进而使吐鲁番成为天山南北各地最早实施郡县制的地区。唐朝对西域各地的统一活动就是从收复高昌开始的,在此设置最早的统一管辖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管理机构——安西都护府,以及专理该地事务的西州。之后西州、庭州(吉木萨尔)和伊州(哈密)三地遂成为唐朝政府广泛推行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地区。元朝在这里建立了“按察司”、“宣慰司”等管理机构。清朝则先后设领队大臣和吐鲁番直隶厅。

吐鲁番在新疆历史上的显要地位,还因该地各族人民具有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而得到有力体现。高昌王国时期吐鲁番人民反对麴文泰的倒行逆施,渴望祖国统一,元代著名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不惧威胁利诱,坚决反对分裂的不屈表现,清朝的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率领维吾尔族人民勇于抵抗各种叛乱等等,都是这方面的集中代表。他们的动人事迹迄今仍在广为流传,成为吐鲁番地区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佳话。

重视对吐鲁番地区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大力宣传吐鲁番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的需要,不仅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还将极大地提高我们对目前开展的“四个认同”(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活动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理解,并对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维护民族团



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自觉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此而言,由吐鲁番地委组织一批专家编写出版的这部《吐鲁番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从令世人瞩目的敦煌吐鲁番学创立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出版的以吐鲁番历史为内容的学术论著可谓浩如烟海,但是作为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吐鲁番历史的专著,这部《吐鲁番史》还是第一部。这是吐鲁番地区思想文化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和准确认识吐鲁番历史文化提供有益的帮助。是为序。

宋爱荣

2004年8月



前言

吐鲁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颗明珠，也是全国一颗耀眼的明珠。这颗明珠之所以耀眼，不仅在于它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地貌、全国知名的葡萄等特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吐鲁番盆地的地面上，留存下来很多古代的城堡遗址，大的如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小的如东面的赤亭城、西边的石垒城、额敏塔等，还有许多佛教石窟和寺庙遗址，如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佛寺遗址等，而在它的地下，又蕴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物，上起石器时代至周秦，下迄明清，既有汉族的，也有北方各个民族留存下来的实物或文字记录，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维护、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吐鲁番学。

中国吐鲁番学的发展，若论其源流，可追溯到清代中叶。自乾隆最后平定新疆以来，西域历史、地理、民族及文化，引起了国人极大的



关注。乾嘉以降,官宦学人,西行考察、踏勘调查者接踵而至,其考古见闻、行程记事的著述纷纷刊行于世,如乾隆间印行的椿园著《西域见闻录》,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西域释地》,俞浩的《西域考古录》,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等,都或多或少地关注并记述了吐鲁番盆地及其周边的历史文化遗迹,也不乏对这一地区历史的探寻、考证。这些著述虽然还不能算是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但却是中国吐鲁番学之滥觞。它是与当时国家的新统一、民族的新联合、边防需要建设的形势相联系的。

洎至近代,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骤起,西北边疆遭到沙皇俄国的蚕食,加之各个国家的探险队、考察团纷纷来到天山南北,特别是吐鲁番盆地这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埋藏的地域,进行文物调查、探检和盗掘。这也刺激着国人,有的愤起为痛失国宝扼腕急呼;有的也致力于收藏地上地下出土的文物,或着手进行研究、论证,从此也就走进了近代吐鲁番学的大门。1906年前清官员端方往欧洲考察,在柏林博物馆见到了德国普鲁士探险队从吐鲁番运去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功德碑》,惊讶之余拓得数纸带回国内,引起了国人的震惊,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对吐鲁番出土文献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如学者缪荃孙、杨守敬等人纷纷作出跋语和评论,1907年罗振玉还校录其文,作出考证,随后发表在《神州国光集》第6集上。这应是中国学术界对吐鲁番出土文献关注的开端。

1911年王树枏撰《新疆图志》卷87《古迹志》(后单行出版名《新疆访古录》)登录了著名的《唐张怀寂墓志铭》及各私家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等十余件,并对每一件文献作出考订、研究或说明。1914年罗振玉出版《西陲石刻录》,及时公布了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带走的墓志、碑刻、文献,并作有跋语说明。与此同时,罗氏还根据诸石刻墓碑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并作成《高昌麴氏系



谱》。1916年罗振玉又出版《高昌壁画菁华》，向国人介绍了被德国探险队携往柏林的吐鲁番石窟壁画精品。1923年前后，王国维发表的《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及《高昌宁朔将军魏斌造寺碑跋》，即是结合出土古文献对吐鲁番历史进行的研究。这些都是中国吐鲁番学早期的成果。

1928年中国的学术团体协会面对着世界列强派出各类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进行探险、掠夺的现实，组成了中国自己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展了中国学术界对吐鲁番等地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考察团成员黄文弼于1928、1931年两次对吐鲁番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作了考察、发掘，还调查了诸古遗址、寺窟等。这是中国吐鲁番学划阶段的大事。如果说在此以前中国学术界对于吐鲁番的历史文物和文化还只限于介绍和认识阶段的话，那么自1928年以后则进入了实际考察和研究阶段。

1931年2月黄文弼发表了《高昌》(第一分本)，5月又发表了《高昌专集》(第二分本)，将他在吐鲁番考察发掘所获得的高昌王国至唐代的122件墓砖砖文悉数公布，并作出考订。在此基础上，他还对高昌王国魏氏王朝的纪年和职官系统作了研究。1933年黄氏又将吐鲁番墓葬中所获得的陶器加以整理，汇集出版了《高昌陶集》。接着又撰写了《吐鲁番考古记》，叙述了他在吐鲁番的考察经过，刊布了15件出土古籍、古佛经写本和印本，还有各代社会文书26种，以及一批回鹘文字的古写本、印本文书，并作有考释。此外还有壁画、佛像、古钱等文物，并于1954年出版。所有这些考古成果及其文书、文物的公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术界对吐鲁番学的认识，开始意识到须将吐鲁番出土文献、文物遗迹与墓葬碑铭，一定要与传统的历史典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认识其时代背景及其价值和意义，而这种研究又反过来可以丰富吐鲁番地区历史内涵。然而，至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界所能掌握的吐鲁番出



土文物、文献仍然很有限,而传统史籍对吐鲁番地域的记载毕竟不多,要完全揭开吐鲁番历史神秘的面纱,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吐鲁番学的故乡在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后,这门学问一开始兴起就带有浓厚的国际性。

19世纪末叶以来,世界列强如俄、英、德、日等国的探险队先后来到吐鲁番,对这里地上、地下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考察、盗窃,也对盗走的文物、文献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许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新成果,有助于对吐鲁番过去历史的认识;也有一些研究,不顾吐鲁番地处东方的这个实际,不顾吐鲁番历史上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史实,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待吐鲁番,竭力从欧洲文化中寻找吐鲁番的文化渊源,歪曲了吐鲁番自身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这就赋予了我们一个严肃的任务:必须正确科学地阐明吐鲁番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吐鲁番学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及考古工作队。不久,吐鲁番地区也有了文物保护管理所,在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吐鲁番地区的古城遗址、佛教石窟、各种古文化遗存及文物进行了普查,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维修和保护。在国家的资助下,从1959年起,开始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葬群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直至1975年,前后大规模发掘13次,在所掘456座墓葬中,出土了内容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其中有203座墓葬出有十六国、高昌王国及唐代的纸质文书近万片。新疆博物馆考古工作队边发掘、边整理、边发简报,使学术界及时知道吐鲁番考古学方面的进展,这是吐鲁番学学术发展史上划阶段的大事,也是新疆考古专业工作者对吐鲁番学作出的杰出贡献。

1975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著名权威学



者、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全国专家学者组成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及时对这批文书展开了研究和整理，并自 1981 年起陆续出版了经过细心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这项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果，标志着中国吐鲁番学的研究跃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中国的吐鲁番学已全面走上了自行发展、自主研究的道路。围绕着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国内学术界开展了热烈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具有创见性的新研究成果。在出土的民族文字、如吐火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蒙古文等文书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佛教石窟、古城遗址方面，也多次进行了调查、登录、摄影、清理、保护性的维修和研究，也发表了许多新成果。90 年代以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对交河车师人墓葬、苏贝希、洋海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对出土古文献和文物的研究，就是对历史上不同时期吐鲁番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真象的揭示。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为正确科学地认识、阐明吐鲁番历史，无疑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实证材料和基础。

上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陆续公布了一些从吐鲁番劫走的古文献，并发表了一些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如马斯伯乐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考释》，公布了英国人斯坦因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掘走的文书；50 年代末，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陆续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其中第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发表了日本学术界对从吐鲁番墓葬拿走的汉文文书进行系列研究的成果；70 年代后期，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在其“录文”部分，整理拼接了六百余号吐鲁番出土的社会经济文书；与此同时，东洋文库又出版了山本达郎、池田温、土肥义和等人整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系列；80 年代以来，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小田义久又完成了三卷《大谷文书集成》



的编撰出版。德国携往柏林的吐鲁番文书,多以寺院遗址与石窟为主,佛经和民族文字文书居多,70年代以来,也出过两本吐鲁番文书汉文经卷目录。另外,德国科学院还以《吐鲁番文献》为题,发表了若干辑研究专刊。俄国拿走的吐鲁番文书,虽然迄今公布甚少,但也能从《俄藏敦煌文献》(1994年始在上海陆续出版)中了解到一些。世界各国对吐鲁番文献的公布及其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丰富了对吐鲁番历史认识的基础。

进入新世纪后,全面系统地阐明并编撰《吐鲁番史》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此以前,虽然已有一些著作先行涉及到吐鲁番的历史文化,但毕竟各有其侧重点,或过于简略,或过于专深,或专重于文书编年,或流于传闻故事。因此,编写一部详略适度,既有学术内涵,又能雅俗共赏的符合吐鲁番历史实际的著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吐鲁番史》的编撰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吐鲁番盆地几千年来可考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共同缔造这个地域的历史。从盆地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并结合史籍记载来看,吐鲁番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或四个千年。

第一个千年是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一千多年,这是车师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依据车师人文化遗址及对出土文物的观察,他们以狩猎和畜牧经济为主,兼及少量农业,有较发达的制陶、纺织、皮革业,他们与匈奴人接触较多,与中原的汉地、西面的焉耆、乌孙也有交往,并从这些地区引进金属器具、生活用品和制陶技术。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世纪的车师前国有户七百,六千余人;车师后国有户近六百,四千七百余。车师前王居于交河城;后王居于务涂谷,其时受到匈奴的支配。据对车师墓群发掘资料看,在这一千年的后期,车师社会已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



第二个千年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8世纪,这是汉人在盆地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汉王朝为了削弱北方劲敌匈奴在西域的实力,打开通向西方的通道,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帝命从票侯赵破奴领诸国兵往击楼兰、车师,擒楼兰王,汉使王恢俘车师王,车师由此分裂为8国。天汉二年(公元前99),汉用楼兰兵攻击车师。征和四年(公元前89),汉军在进击匈奴的同时,发动楼兰、尉犁等国兵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于汉。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内乱,车师才较稳定地臣属于汉王朝。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汉使者郑吉派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并建立戊己校尉,此后屯民逐渐增加,戊己校尉便由交河移治高昌壁,归属于汉西域都护领导。大批汉民及士卒在盆地屯田积谷,一方面为了驻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建立起一个对西域城郭小国进行救援的粮食基地。同时也带来了内地的一套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这是对吐鲁番盆地开发和建设作的贡献,也是汉王朝西域都护在尽自己都护的职责。

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归属于凉州刺史所领导,汉民来盆地进行农业垦殖者续有增加,汉民的民政事务越来越多,原有的戊己校尉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在前凉建兴十五年(327)便改戊己校尉为高昌郡,下设高昌、田地二县,戊己校尉只以军营名而存在,同时监护交河城的车师国事务。从此,吐鲁番盆地便进入到与中原一体的郡县制时代。高昌郡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诸政权的统治,其郡守官员或由中原诸凉政权委派,或由高昌当地汉族中的大族代表所充任。

北凉建平三年(439),北魏攻灭北凉,北凉余部沮渠无讳、安周兄弟率军民进军高昌郡,赶走高昌郡太守阚爽,于建平六年(442)无讳在高昌城称凉王,建元承平,不久,沮渠安周执政,攻灭了交河城的车师国。沮渠无讳、安周等虽族属匈奴别部卢水胡,但早已汉



化,故他们在盆地维持了 18 年的大凉政权,可以看作是汉式北凉政权在盆地的延续。

承平十八年(460),柔然国攻灭沮渠大凉政权,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高昌王国又经历张氏、马氏、麴氏诸汉人大族的统治,直至 7 世纪。其中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间最长,约 140 年。

从戊己校尉到高昌郡,再到高昌国,汉人逐渐成了盆地的主体居民,即“汉魏遗黎”,统治集团都是汉族大族,在政治、经济上施行的都是中原的汉晋封建制度,在礼仪风习上,从国王到百姓都提倡尊孔读经,崇尚诗书礼乐,讲究忠孝仁爱。尽管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段里,他们也受到一些胡化的影响,但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中原王朝是他们的宗主国、母国,故多次朝贡于北魏、北周、隋、唐。在盆地也居住着人数不等的车师人、柔然人、突厥人、吐谷浑人、粟特人和西域胡人。高昌汉人政权并没有排斥这些民族及其文化,往往能兼收并蓄,以适应各族的需要。

唐贞观十四年(640),唐进军盆地,灭高昌国,建西州,同时还在此建立了统管天山南北的安西都护府。显庆三年(648)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西州升格为西州都督府,在行政上推行了内地的州县乡里制,西州之下设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 5 县,其下总有 24 乡;在经济上贯彻了内地行之已久的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在军事上推行了隋唐府兵制,并建置了四个军府;在用人方面推行了乡县学及科举制;在交通通讯上施行与内地联为一体的馆驿制度。这是整个封建时代对吐鲁番盆地的大开发和全面大建设。在唐王朝经营西州的一个半世纪里,西州完全与中原融为一体,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在管理制度和文明程度上,都能与内地一致起来。这已为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汉文文书所证实。

在这第二个千年中,吐鲁番盆地开拓出了无数的沟渠,垦辟出了成片的农田,盆地也由过去以畜牧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农业为



主的经济。除谷物外,一些新的物种,如白叠(棉花)、蒲陶(葡萄)、蚕桑等都被引进到盆地大量种植,以发展生产。盆地由此逐渐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不仅“高昌锦”、“高昌乐”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且吐峪沟、伯孜克里克、胜金口、雅尔崖的各类宗教石窟寺也开凿于这一时期。

唐贞元八年(792),吐蕃一度攻占了西州,盆地的统治权发生了转移,历史又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期,进入到另一个千年。

第三个千年是9世纪至18世纪,这是以回鹘人为主体的在盆地生活的时期。回鹘人是在协助唐朝攻讨吐蕃的形势下来到盆地的。由于吐蕃陷落西州时,将唐西州主要军政官员内迁,加上唐朝内部矛盾重重,已无力再恢复对西州的统治,于是进入盆地的回鹘人在经历与吐蕃等势力的反复斗争后,终于代替唐王朝在西州行使统治权,于咸通七年(866)由仆固俊建立西州回鹘王国,称登里可汗,同时请求唐朝给以册封认可。

回鹘贵族与唐王朝的关系一直很好,早在7世纪的唐初,漠北的回纥王国可汗就向唐称臣纳贡,受唐册封,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在漠北与长安之间修建“参天可汗道”(又称“参天至尊道”)。唐朝出现安史叛乱后,回鹘派出兵马支援唐朝平叛,当吐蕃入侵唐河西、关中时,回鹘又助唐抗击吐蕃。唐皇室与回鹘贵族之间长期以来互为婚姻,结成一种和亲舅甥关系,回鹘贵族常以自己是唐朝的外甥而自豪。

当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回鹘南迁,其中仆固部的一支入驻西州时,唐朝廷也作了认可。唐朝认为“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纳奉”,同时又能“为中夏保障”,使“北边无警”,应该给以册封。由此,西州回鹘便成了唐王朝的藩属国,在行政上仍保存了原有的西州四府五县制,在经济上接纳了西州原有的农耕生产模式,原有的汉人也逐渐融入回鹘人的生活,西州原有的佛教信仰也成了西州